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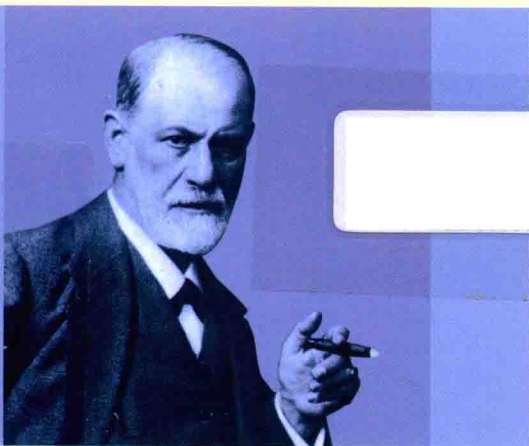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
Freud's Five Case Studies

灵魂的家庭经济学

弗洛伊德五案例研究

[加]约翰·奥尼尔 著

孙飞宇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

本书的翻译工作同时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现象学社会学新流派及其对基层社会的应用研究”课题的资助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
Freud's Five Case Studies

灵魂的家庭经济学

弗洛伊德五案例研究

[加]约翰·奥尼尔 著

孙飞宇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的家庭经济学：弗洛伊德五案例研究 / (加)
奥尼尔著；孙飞宇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5

书名原文：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
Freud's Five Case Studies
ISBN 978-7-308-15795-7

I. ①灵… II. ①奥… ②孙… III. ①弗洛伊德，
S. (1856~1939) —精神分析—案例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9974号

灵魂的家庭经济学：弗洛伊德五案例研究

[加] 约翰·奥尼尔 著 孙飞宇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王 雪

装帧设计 骆 兰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92千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795-7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致 谢

感激所有那些参与周二下午研讨课，在我家中和我一起精心研读弗洛伊德案例史的社会与政治思想的研究生们。研讨课一般安排在午后的几个小时里。略近黄昏时，我们便会越发沉浸于维也纳和伦敦的时空交错中所弥散出的浪漫气息里。我们工作的进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感谢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基金（SSHRCG）从1988年到1991年对文本—精神分析研究的资助。viii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凯普（Tom Kemple）、基奥夫·米奥斯（Geoff Miles）、盖瑞·基诺斯科（Gary Genosko）和皮特·弗兰特（Peter Flaherty）等人都各自完成了富于原创性的学位论文和一系列后续工作。他们的工作都各有千秋。而在过去的这十年间，我所开设的关于精神分析、法律和文化的研讨课，还受惠于以下诸位的创造性贡献：马克·费泽斯通（Mark Featherstone）、史翁·霍洛韩（Siobhan Holohan）、莫里·曼（Molly Mann）、弗兰克·赦勒（Frank Scherer）、伊格·冈却洛夫（Igor Gontcharov）、弗兰克·西米欧（Frank Cimino）、孙飞宇、兰恩·玛特隆（Raan Matalon）和阿德南·塞利莫维奇（Adnan Selimovic）。

与此同时，我对于弗洛伊德文本的解读，也因诸多大学的邀请，

而经历了“在路上”的考验。我的行程从夏威夷大学到斯坦福大学，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波士顿大学，还有麦基尔大学、多伦多大学、都柏林大学、肯特大学、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等等。这一旅程终结于伦敦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在伊万·沃德（Ivan Ward）的盛情邀请下，我在这里做了最后一站的演讲。我在距离伦敦只有数英里之遥的地方长大成人，却曾经对其一无所知！

最后，由于我坚持在我的研究中用笔写作，我必须要感激布拉德·金（Brad King）和乔丹娜·罗伯-皮尔斯（Jordana Lobo-Pires）的大力协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手稿无法成印。我当然还要感激苏珊。她以优雅的方式，使我的工作得以付梓。

出版商致谢

感谢伦敦派特森·玛氏有限公司 (Paterson Marsh Ltd., London), ix
以协议的形式惠允我们使用弗洛伊德标准版著作中的图文。

经出版商允许, 本书第五章摘录了丹尼尔·保罗·薛伯 (Daniel Paul Schreber) 的《我的神经症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本书英文版由艾达·麦克艾潘 (Ida MacAlpine) 和理查德·亨特 (Richard A. Hunter) 编译; 塞缪尔·韦伯 (Samuel M. Weber) 为该译本作了新译序 (pp. xviii, xxxvii, 52, 79, 175, 208-21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年的版权属于哈佛大学。1988 年的前言版权则属于当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版本。

Contents

目 录

致 谢 i

出版商致谢 iii

导 言 1

爱的故事 3

精神分析的身体—灵魂 11

第一章 弗洛伊德的宝贝——小汉斯
(1909) 15

将马车放在马前面 39

第二章 打开多拉的案例
(1905 [1901]) 52

多拉的梦 76

多拉的肖像 93

多拉的《西斯廷圣母》 101

第三章 鼠人的女士 (1909) 121

一个关于失明与 (洞) 见的案例 124

分离结构与制图学 131

捕捉鼠人的思维序列 144

鼠人的 (错) 婚 152

第四章 狼人之醒

(1918 [1914]) 162

附录与校正 168

狼人的密码术 187

第五章 薛伯的神佑升天

(1911 [1910]) 197

薛伯的阉割 / 创世 212

薛伯的天鹅之歌 229

结语后记：精神分析之债 265

参考文献 271

索引 280

译后记 285

导 言

本书名为《灵魂的家庭经济学》。它所讨论的，其实是一出关于想象斗争的戏剧。这出戏剧发生在家庭内部，也发生在分析师与屈从的病人之间。成败的关键在于抵抗弗洛伊德建立俄狄浦斯式家庭的努力。这一努力的关键，是重新发现养育式（mothered）家庭，在所有的谋杀与篡夺的遗产之外，对于一名儿童的重新接受。不过，这一接受却也同时存在着痛苦与艰难。

由此观之，在《小汉斯》（*Little Hans*）这部被广泛忽略的作品中，我们就收获了一场呢喃叙事。这一叙述被图解、绘画、童话、动物寓言集和各种各样的梦所不时打断。在此叙述中，弗洛伊德的宝贝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抵抗。类似的策略也见于多拉（*Dora*）在与那些丈夫们 / 妻子们 / 父亲们 / 母亲们之间的三向斗争（three-way struggle）中。这些人引诱着她，同时也被她所引诱。类似的，极度困陷在其母亲与“情人”（mistress）之间的鼠人（*Rat Man*），则上演了一场不可思议的铁路旅行，完成了一场分离式（onastic）婚姻以便消除母爱。这些案例都相对较短。这或许是由于弗洛伊德急于证明自己那超前的分析能力。不过，狼人（*Wolf man*）却终生都在拒绝弗洛伊德的拥抱。他设定了一个非凡的关于狼群、蝴蝶与屁股的

寓言集，以抵抗打着精神分析旗号的同性恋化（homosexualization）。同样，薛伯（Schreber）对于他自己那神圣的飞升进入母性（divine flight into motherhood）的记录，则开启了一种与弗洛伊德的教父文本（patristic texts）以及薛伯生父的基督徒行为手册之间奇异的、文本之间的斗争。

尽管女权主义者批评弗洛伊德从未将妇女作为真正的讨论主题，然而在她们的内部，关于永恒的母性 / 女性（das Ewig-Weibliche）这一主题，却也是众说纷纭。不过，弗洛伊德的母性考古学永远会返回到自我生殖的男性上帝 / 艺术家 / 科学家，正如我通过小汉斯的表演、多拉的圣母狂喜 / 出神（trance）和薛伯的神佑升天^①所表明的那样。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的生母。他纵容年轻的多拉与年幼的小汉斯，对狼人则更为严厉，甚至从未倾听过薛伯。不过，这些案例史同时也是关于精神分析之生父的自我纪念碑。我力图表明，这些竞争性的自我概念是如何深深地织入了关于弗洛伊德那些案例史的文本性经济（textual economy）之中。这些案例史都呈现在一种多元声音的文本中。在这种文本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逻辑—科学式叙述，包括生物学、神经病学、化学，以及人类学、考古学与神话学。不过，我们

2 只有通过对这些案例史本身的耐心的 / 作为病人的阅读，才能有此见解。所以，这并非是要揭示弗洛伊德的内在矛盾，正如弗洛伊德本人也并不是必要性的修改、修正与重返精神分析的文本自身之尝试的原因。所以，我要首先仔细分析每一个案例史本身，然后才会考察相关的临床与批判性文献。

由于弗洛伊德的文本总是在被“忽略”和被“修正”，所以它的读者们只好不去以任何一种字面的方式来尝试校正。同理，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本身或许也在被书写的同时，带有一种类似的对于修改的允许。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之中的那些“盲点”（那些被“忽略”之处）确实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自身之中的俄狄浦斯维度。这一理论的

① 借用圣母升天（Assumption）一词，以示薛伯本人作为上帝之妻子而升天。——译者注（本书中所有的脚注都为中文译者所加，后文中将不再一一注明）

每一处洞见，都与它自己的盲目纠缠在一起；每一种诠释，或许都要饱受“过度诠释”（*Überdeutung*）之苦；每一次发现，都会掩藏与遮蔽某些东西。弗洛伊德如是说。然而理论的后裔需要谨慎前行。父性诠释的失败已经被父亲自己注明；它们由这位理论家的自我满足所构成。弗洛伊德坦然承认他的失败，但是却热爱这一工作的激情——这正是精神分析的文本身体（*literary body*）。它属于弗洛伊德式文本的快乐，所以它的运动往来如梭（*nachträglich*），所以它的作者知道它将在何处导引或者误导他自己，在何处会带来洞见，在何处会蒙蔽自己。以此方式，弗洛伊德能够邀请或者回击每一种对于精神分析之基本洞见的抵抗，原因就在于他的对手们、修正者们和批评家们会“忽略”或者拒绝“看到”其最基本的关于无意识的发现，这是他所有的洞见与盲目的创造性源泉。

爱的故事

我视精神分析理论为一种爱人的话语。在这一话语中，充满了不确定性——除了那些理解和领悟的喜悦时刻。不过，如果想要避免枯萎凋零，这一话语就不得不摆脱这样的时刻。所思所想，无非都徘徊于经济/秩序和越界之间，踟蹰于优雅自矜和无止无境之间。要将这些极端的状态分离开，思想需要一条通路、一片森林、一个湖泊、一处洞穴、一位女神，正如爱欲和死欲必须要二元分立、不能重叠一样。以此方式，思想或可将死亡（*Death*）或爱（*Love*）设为自己的目标，作为其灵魂的女士（*Lady*）。不过，灵魂自身当然也会被它自己的梦境、幻觉和知识所猎取，所困扰。这些梦境、幻觉和知识从灵魂的无意识亦即它的创造体中生发而出。我决定运用“灵魂”这个术语以强调精神分析的恰当场所，就在于行为举止的心灵与肉体要素彼此弥合为一处的地方。这一用法并不意味着要“灵化”（*spiritualize*）弗洛伊德。相反，它将弗洛伊德关于灵魂的原初现象

3

学 (original phenomenology) 复原为意识的与无意识的行为。而这一点, 在斯特拉齐 (Strachey) 的翻译中, 却被一种认知主义的假象所遮蔽 (Bettelheim, 1983)。在我看来, 精神分析与一种关于双重诞生 (double birth) 的叙述密不可分——一种是我们在母体 (mother-body) 中的起源, 一种是给予生命的欲望之起源, 或者是像她一样诞生我们, 或者是像父亲一样, 诞生法律、艺术与科学。我相信单性生殖 (parthenogenesis) 的幻想居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概念的核心, 尽管它从未完全呈现出来, 而仅仅间或闪现在各个案例史中间。我并不认为弗洛伊德主张某种“羊膜怀旧” (amniotic nostalgia, Gunn, 1988: 189), 尽管他也从未打碎母性之镜。弗洛伊德确实因父之名而抗拒重返母性之源。但是他也明白, 父亲已死, 空余一种盲目的乱伦之爱。而这一爱的代价, 将会由儿子自己的牺牲来偿还。如此, 弗洛伊德在死亡中, 幻化出了差异的和解 (*Versöhnung*), 将出生系于终结, 并生产出作为精神分析之“时间针脚” (time-in-between) 的记忆与无意识。

在精神分析中, 我们仅处理一种语言之中的疾病。一种疾病的界限, 在于其语言的缺失。一次治疗的开始, 是某种症状以另一种语言, 在身体之上、在梦中、在言语中或是在写作之中, 对它自己的关注。健康是一种表达出来的需求, 起始于宝贝的啼哭, 并会在未来转变为情人的歌谣。艺术、音乐与文学通过把受难的肉体在智识与共同体的层面上精准表达出来, 从而拯救身体—灵魂, 使其免于疾病之苦。在这中间, 欲望会被任何身体可以丢掉的细微之物所唤醒——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恋物。丢掉它会令人绝望; 在其中, 则会令人欢欣。疾病要求一种神话学, 一种表达出来的抱怨。病人就是讲故事的人。分析师则是听众, 在聆听中力图重构这样一种家庭: 于其中, 病人的故事发端, 并且作为一种有自身风格的症候学而发展演变。一门小小的艺术, 从某种疾病的案例中, 抽离出疾病的过程, 从病人那里, 抽离出诗歌。于是弗洛伊德陷入了与生产之妇女的热恋。就如同神秘主义者一般, 她们是受到上帝宠爱的母亲和歇斯底里者。在此, 所有的案例史都是爱的故事:

这一神秘主义的立场，源自于女性。这些女性从一位缺席的上帝那里，拿到了他并不具有的东西——一具能够满足她们的、带有菲勒斯/阳具的身体。从这一立场出发，拉康为精神分析总结出了一个教训：分析师是给予他他并不具有之物的人，也是拒绝给予他他所拥有之物的人。精神分析师是爱的生物，而精神分析，则是一种多情的规训，一种爱欲性的理论，一门纯粹享乐的技艺。(Clément, 1983: 143)

4

弗洛伊德单人只手创造了精神分析。然而，他却常将其说成是一种诞生，并因此而以一种他期待自己如是的女性形象来塑造其命运。与薛伯一样，终其一生，弗洛伊德都献身于女性的命运。那些关注多拉案例的女权主义者们(Bernheimer and Kahane, 1985)在拒斥弗洛伊德对于女性(womanhood)的隐秘内容并不了解的时候，或许过于轻率了。恰恰相反，弗洛伊德从未放弃过探索女性的计划。在男人和女人那里都出现的拒绝女性性欲的倾向，是一则弗洛伊德在终其一生的职业生涯里，都在耐心破解的谜题。正如许多当代批评家所坚称的那样，这当然并非一种性意识形态。另外，弗洛伊德这一名字本身已经表明，女性的欢愉(Freude)^①应该成为他的研究背景。这一点正如他用其他女人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女儿们，将过去、当下和未来都与精神分析的命运绑定在一起一样(Appignanesi and Forrester, 2005)。因此，精神分析之谜，并不在于女性自身，而在于作为女性们(women)的女性(woman)，也就是说，作为命运三女神(the Three Fates)、作为舞蹈^②以及作为美惠三女神(the Graces)的掷骰子游戏。

弗洛伊德相信，未来是延迟了的过去。我们的自我理解，并非经由我们当下的所说所做，而是通过我们行为之中的种种缝隙才得以成为可能。这些缝隙能够用“另一种语言”，或者用我们表达中的种种

① 弗洛伊德(Freud)与德文Freude(快乐, 欢愉)仅一个字母之差, 故有此说。

② 尼采的舞蹈。详见后文。

特质，来揭示一种过往的愿望 / 欲望：“快乐是一种对于史前愿望 / 欲望延迟了的 (*nachträglich*) 满足” (1997)。事实上，弗洛伊德本人就是在同一个考古学隐喻的基础上，建造了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在他关于谢里曼之特洛伊的儿童期研究中，关于这一隐喻的实践曾经让他激动不已。无意识的各个层次，成了弗洛伊德的罗马。他梦想着经由精神分析而将其攻克。拉康曾经不无善意地安排了这一“被审查章节”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的个人无意识历史围绕其而罗列的内容：

—在纪念碑中：这是我的身体。也就是说，神经症的歇斯底里的核心。在神经症中，歇斯底里的症状揭示出了语言的结构，并且犹如某种碑文一般被解密。这一碑文一旦被发现，就会在不招致任何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被破坏；

—在档案资料中：这些是我童年的记忆，正如那些我不明其出处的资料一样无法理解；

5 —在语义学的演化中：这与词语的储存相应，也与对于我自己特殊的词汇表的接受相应，正如它对我的生活之风格和我的性格的影响；

—最终，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要由变形而得以保存的线索中，那不再纯洁的篇章与环绕它的其他篇章之间的关联，使得这一变形成为必然，而这一变形的意义，则将要经由我的注解而被重新建立。(Lacan, 1977a: 50)

精神分析的基石，在于一种早期的创伤会伴随着自然增长的后期经验，而变得重要。这些经验会将其重新置于文本之中，也就是说，与此同时它们将迷失的线索置于一种文本之中。这一文本迫不及待的要给予它充分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它，这一线索将依然会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谜语。

每一个案例史都会在关于心灵的经济中打开文学的功能。这是弗洛伊德同时作为一名作家与一名医生的必要性所在——如果这一必要性不是出于弗洛伊德那无法逃避的成为他自己的历史人物

这一命运的话。弗洛伊德在写作这些案例史的时候所发现的，是他们的叙事性无法做到坚定不移。正如我们在鼠人的案例中所见的那样，这一事实属一种无意识性的分枝蔓延（*chorisis*）、东拉西扯和翻来覆去。这些特质持续不断地推迟了它们想要表达的行动。同样，弗洛伊德也无法把握他自己的发现，而我们也不会通过追溯他所留给我们的症候群文本来苛责他。不过，这一“过度”的特征，与弗洛伊德在写作之中的不确定性，是那些伪专家们——如果不是假道学的话——在顽固地运用弗洛伊德的洞见来苛责他自己的观点时，必须要铭记于心的。一位作者，无法在阅读他自己的时候不处于一种写作状态；而为了实现这种写作，他/她必须要脱离对于写作欲望的语言学依附（*Sprachliches entgegenkommen*）才得以可能（O'Neill, 2001）。只有在他个人的神话中，弗洛伊德才是弗洛伊德之源。更何况，弗洛伊德是通过一种在各个案例史中所呈现出来的神秘的间接性才为我们所知。科学的神话就在于，任何科学都能够像蛇蜕掉它的皮一样而抛开它自己的历史。如此，精神分析不能自力更生。而我们阅读那些案例史，也要像阅读短篇故事（*wie Novellen*）一样，正如在今天，阅读哲学必须要像阅读精神分析那样，才得以可能。

弗洛伊德强加于精神分析的文本——或者说，他与之斗争的文本——就是病人在用词语表达他/她的经验时，所经历的同一种限制。这一限制与文学体例无关。相反，“文学”本身是由这些限制构成的——这些限制复述了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在特定的记录中所做的俄狄浦斯式叙述。弗洛伊德将这种探索永恒诠释的人学，看作足以理解心理疾病现象的自我知识的唯一模式。而那些预见精神分析之后果的人，则徒劳无功地表示要加以抵抗。另一方面，那些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却无法预见其后果。在这一接受与拒绝的历史中，弗洛伊德的文本一直都是精神分析里的那座迷宫。在这座迷宫中，有的道路曾被走过，也有道路从未有人涉足。无论如何，在文本中，我们都永远无法摆脱那些围绕着光线的阴影。我们当然也不能否认自己在对弗洛伊德作出特定阅读时，所负有的责任。当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误解这些文本时，这是必然迈出的一步。这一声明似乎并不坦

诚。然而弗洛伊德坚持其必要性。原因在于，公众拒绝接受婴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这一核心发现，也拒绝接受原初场景（primal scene）的积淀。如果弗洛伊德的公众无法相信他们的耳朵，那么他的读者们也就无法相信他们的眼睛。其实，精神分析给教养意义上的意见和常识所带来的侮辱从未减弱过。当然，它也绝无机会这么去做，因为精神分析的关键在于：将思想的起源定位在一种我们最早的身体性探求所建立的有意疏忽上面。公众并不希望在精神分析的家庭浪漫剧之中，看到他们自己。弗洛伊德一次又一次地求诸他的“女士们与先生们”的公正之心，似乎是为了说服他自己：是他以一人之力，创造了一种满怀激情地观看这一原始戏剧的理想观众。在他对小汉斯的治疗中，他冒着被拒斥的风险，将这一原初历史安置到文明化了的观众面前。对于这一若非因他之故则早已被遗忘的发现，这些观众们的反应，却是将弗洛伊德简单视为一种文明化失败的例子。他的科学遭受着各种被边缘化或者被审查的危险。因为这一科学威胁到了文明化的知觉与道德的各种界限。更有甚者，弗洛伊德的“你也一样”（*tu quoque*）这一说法，似乎是一种傲慢而又孩子气的、对于那些精神分析所赖以获得接受的每一代人的非难。然而，一旦幼儿性欲首次作为一个科学问题而被提出、被公开，精神分析就重写了文明史，并缩短了童年（childhood）与成年（adulthood）之间的距离。

弗洛伊德熟悉科学，所以明白精神分析必须要有它自己的故事。因此，弗洛伊德对于那些案例史的故事性忧心忡忡，却并不太在意它们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这一点可以参照他对于文学故事这一竞争对手所具有的深刻洞见的嫉妒之情。在他看来，文学故事似乎已经事先（*avant la lettre*）掌握了精神分析。另外，那些令弗洛伊德心驰神往的科学与文学的伟大榜样，彼此在风格上要比今天更为接近，而且还分享着相同剧院戏场的公众舞台。所以，沙可的诊所表演对于早年的弗洛伊德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不过，案例史并非剧场演出。他们并不依赖于催眠术，也并不要求身体服从科学的高级神甫。相反，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的剧场转变为交谈与梦的亲密空间，分析师必须要在这一空间中对交谈和梦都勤学苦练。他开始解码躯体的脚本。由于

这一脚本中的语言极力抗拒在科学文本层次上的翻译，所以弗洛伊德只有发明案例史这一体例，以便记录构成其实践的各类事件。对于婴儿身体记忆的发现，使得所有种类的艺术与科学的叙事能力都焕然一新。当然，这实际上还代表了弗洛伊德对于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贡献。

我们无法在谈及弗洛伊德的病人时，不去关注他们所遭受的压力：成为弗洛伊德信徒的压力。亦即，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同时既成为病人，又成为探索性的分析师。当代的评论家们通常并不允许弗洛伊德在其失误方面，拥有历史性的“折扣权”。他们更乐于根据这位全知全能之父的罪，而向他投掷石块。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真正赋予了弗洛伊德全知全能的属性。当然，弗洛伊德的信徒们在这一实践中并不孤独。使得当代评论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量的评论家会同时着迷于宣称这位作者的死亡以及他所有文本的碎片的消亡(O'Neill, 1992a)。然而，这些评论家们不过是重建了纪念碑而已。如此，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所评论的事件，就必然要与批判性叙述绑定在一起，正如在弗洛伊德与“他的”病人们的邂逅中的那些事件，必然要与那些让他们“无法被忘记”的诊所案例史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重复着”弗洛伊德本人的实践，正如他在艺术与文学中——同时也是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中，发现了对于精神分析基本内容与方法的预言。然而弗洛伊德反转事物。他将病人的疾病自身视为“艺术品”，并因此而为精神分析设置了“表达”这一“诊所肖像”的任务。这一“诊所肖像”永远无法从其历史与句法中，完全脱身而出。每一个案例，都会纠缠于在描述中的“溢出”与“碎片化的”记录或“注解”之间的对抗。那些记录或“注解”会将这一“诊所肖像”嵌入到一种同时既是一种疾病史，又是其治疗性建构的解释之中。在传统的案例史中，这一紧张通常并不存在，但是在弗洛伊德的独特实践中，我们立刻就能感受到它的不同凡响。这一实践极富戏剧性，不仅浸染着弗洛伊德自己的生命与生活，而且还使得小汉斯、多拉、鼠人、狼人与薛伯都超越了他们的制造者，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只有在法语世界中，这五个案例才单独集为一卷(Freud, 1957)。 8
我所分析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案例——亦即小汉斯(1909)与薛伯